

李智君
著

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关山迢递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地理

ISBN 978-7-208-09551-9



9 787208 095519 >

定价：4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关山迢递
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李智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关山迢递: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李智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551-9

I. ①关... II. ①李... III. ①地理语言学—研究—西北地区②西北方言—语言史—研究 IV. ①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274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关 山 迢 递

——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李智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7.5 插页 4 字数 457,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551-9/K·1716

定价 48.00 元

序

周振鹤

地理学的性质比较特别,处在骑墙的状态,既有一半与人文社会学科有关,又有一半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不过说实话,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总是要数到文史哲经等等之后才有人文地理的位置;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则要先说到数理化生等等,才轮到自然地理。而且 20 世纪以来,关于地球的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已经用地学一项更广泛的学科名称来综合,其下则有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还有更为专门的冰川冻土这样的专业。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似乎已经空间不大,或者正因为这个缘故,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得最快,真有如历史上的草原民族,其兴也暴,其亡也速,一种新理论登场不久,可能很快就被另一种更新的理论所取代,似乎让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19 世纪以前,地理学还基本上处于描述性的阶段,19 世纪以后,地理学家不满足于对地理现象的简单记录与描述,而要往解析与阐释的方向发展,同时还要在自然与人文的两大领域之下,再分出更细密的研究方向,政治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都在这一世纪的末尾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其理论性也逐渐加强,虽然对比起其他成熟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理论来,还显得稚嫩,但毕竟有许多杰出的地理学家为此而不懈奋斗,从而使得地理学的面貌日渐丰富多彩。

其实即使是历史学这样的古老学科,在中国也是在 19、20 世纪之交才开始有了专门史的分支,而其中文化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专门史更显得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地理尤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比较后进,其理论需要不断创新与改造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而且究其实,从实证的角度对个别地域进行文化地理的研究也还留有很大的空白。近年来,对于中国范围内以省区为对象的实证式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直在进行着,但至今尚未覆

盖所有的省区。如果可能,我们的目标是将省区的历史文化地理实证研究全部完成,以从中得出最基本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认知,而后在这一基础上,再从事全国性的历史文化地理分区工作。李智君的博士论文选择了河陇地区作为他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对象,本书正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修改定稿。

李智君所指称的河陇地区,包括今宁夏、甘肃与青海的河湟地区,这大致是清代甘肃省的范围。这是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一块可农可牧区,在农耕民族手中,就是农耕区,但在游牧民族手里它就会成为游牧区。由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华夏民族及后来的汉族与西南的少数民族生息之处,是欧亚大陆的东部季风区,降水相对充沛,因此自然形成了农耕区。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从事农耕已成为定式,以至这些民族如果移民到其他地方,也一概以耕种为要务。如果有灌溉之利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这种生活方式还大致无碍(其实从大环境说来,亦为不利),如果在无灌溉之利的地区则必定破坏原生的植被而导致荒漠化的结果。

这种以农立国,有地即可农耕的思维定式延续了数千年,一直到 20 世纪达到顶峰,一方面是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将不宜粮作的地区统统改为粮田,另一方面在土地不够时又实行围湖造田、填海造田、开山造田、治沙造田等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措施,终于酿成了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后果。重农主义与以粮为纲僵化了民族的思维,所以在历史上,只要是中原民族所到之处必定是农耕文化传播之处。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游牧民族的思维定式也是凡有水草处必定要豢养牲畜,也要将宜耕区改为畜牧业(当然,过度畜牧也会造成荒漠化)。东汉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农耕区明显内缩,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以后,也因此黄河中上游天然植被情况大为改善,而使黄河安流了八百年之久,这一点已为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所证明。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秦帝国疆域基本上与年降雨量 400 毫米线重合,唯一的例外是塞外的河套地区。这一地区属于半干旱区,雨量太少,明显不适于农耕,但因有灌溉条件可以弥补此不足,所以在中原民族手里则成为农耕地带,而在匈奴治下则成为游牧区。拉锯反复从战国、秦与汉初共有三次,才终于定为农耕区(当然后来也还有反复)。西汉武帝以后,西部疆域扩展至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这一地带的性质与河套地区相同,也有灌溉之利,在汉人手里成为农耕区,而此前无论在月氏人手里或是在匈奴人那里,也都是游牧区。这块地区的归属中原王朝,可以说使汉民族的农耕区达到

了极限。所以河陇地区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手中,明显具有不同的文化景观。自此以后,河陇地区并非永远不变,成为永久的农耕区,而是随着民族的迁徙出现不同的景观变迁,若从文化史层(sequent occupancy,或曰相继占有)的文化地理论而言,每一种文化留下一文化景观,同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留下的景观也有差异,正如同累积的地层一样,从横剖面看来,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堆积,因此河陇地区的确是最适合运用文化地理论进行解析的地区之一。

但是要做到对这一地区的全面的长时段的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地理现实非要从实地踏勘得来,历史地理学者必须以此工作为基石。而历史追溯则不能没有文献基础,此外还要加上器物与遗迹的追寻。文献不管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都要穷尽竭泽,细大不捐。历史与地理论及方法的恰当应用是历史地理学论文成功的保证,这一点李智君是基本做到了,看其在引言中的陈述,便可明白。但由于在吐蕃与在西夏时期,因为文献不足征,暂时无法完全复原其时的文化地理景观的面貌,这在目前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依然是历史研究的要义,历史地理研究既以文献为最主要的基础,任何人不能作无米之炊,所以本书的核心部分主要以农耕时期汉文化为主来进行分析研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更何况作者所选取的是“具有转折意义并有空间资料的时段作为切入点”,因此,就目前而言,就河陇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而言,这本书应该是具有开创性的作用的。

我还想特别提及本书的几处重要发明,以与读者共享。首先,作者利用形胜资料以研究政治地理格局,由此而揭示西北社会的空间格局,看似貌不惊人,其实正是找到了边塞社会的控制机制,由此而让整本书的声气得以相贯。其次,在学术地理研究方面,作者纠正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界的一个普遍的认识错误,并给出了自己的论证和解释。同时又揭示了五凉之后,特别是河陇学术文化一路衰落的原因。第三,在宗教地理方面,提出了边塞地缘政治与佛教汉译中心的转移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分析了河陇民间信仰的地理格局与边塞特征,对一些与环境有关的信仰,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尤其是对河西雪山龙神信仰的冰川水文学解释,宁夏平原河渠龙神的水文学解释,边塞战争与人物崇祀地域分野的发现,都是一种独创。此外,在语言地理方面提出了“语言走廊”的概念与语言的“潮间带”现象,也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至于对知识分子的边塞诗的意义与底层民众的花儿的空间传播模式,以及在民俗研究中揭示的农牧文化之间的交融,也是书中的亮点。要之,李

智君将河陇地区置于中国政治地理的大背景下,分析了这一地区社会演变的动力机制,从而把地方志中的“民风”看作是对区域文化的综合评价,与前人以文化要素为主的研究方法相比,有独具匠心之处。

我还有一个感觉是,幸而李智君是身离河陇而写河陇,如果他在不出河陇的情况下写河陇,绝对不能写得那样深刻。只有认识河陇以外的地区,才能更好地认识河陇本身,我想这可以算是一条最粗浅的普遍真理。黄土高原的壮观我直到年近不惑才有体验,之后又有从新疆倒走河西走廊之经历,有这个基础,我对李智君的论文才算得上有较深入的体认。我从小在花岗岩球状风化的地貌区中长大,以为天下的群山莫不如此;后来到湖南工作,才知道有土石兼具之山;到了兰州五泉山,我完全愕然于世界上竟然有堆土成山的地方;外加在山上听到高亢的花儿,看到唱花儿的人并非演员而是普通农民,才深刻体会到这世界真是万象俱具,自然景观与文化面貌的地理差异非仅读书所能知晓。听高腔而在戏园子里,如同听花儿而在舞台上,都已大失其趣。相异性常常是被忽略的一种基本地理特征,任何人都很容易从自己的地理环境出发来认识世界,即到今日依然如此。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最典型的一句开场白是“过年了,包饺子了”,遂使全世界以为中国人过年全都吃饺子,不知道至少有半个中国的人过年根本不吃饺子。李智君既在河陇生活了很长时间,又离开河陇许多年,对地理差异性的体认是极为真切的。再加以读书期间努力学习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各种理论,并充分占有史料,以至研究颇有所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文化景观的历史变迁并非是历史文化地理的全部,却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涵。李智君对河陇地区的一些具体分析不一定能适用于其他地区,但将文化地理的视角与政治地理及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相信是可以为其他地区的文化地理研究所借鉴的。每一个地区的文化地理研究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去照搬,而要视该地区的特点而确定自己的侧重对象与研究方法,李智君之后,仍然还要有人要继续进行其他省区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让我们拭目以待新的成果的出现。

目 录

序 周振鹤 / I

导言 文化研究的地理视角与历史深度 / 1

卷一 边塞环境与河陇历史社会地理 / 21

第一章 河陇形胜的分层结构与社会空间格局 / 23

第二章 边塞环境与绿洲种植业区历史人地关系的调适
——以宁夏平原灌溉渠务经营为例 / 61

卷二 边塞环境与河陇汉晋学术地理 / 77

第三章 边塞环境与河陇汉代学术地理格局 / 79

第四章 魏晋边塞士族与河陇学术的积淀 / 96

第五章 五凉时期移民与河陇学术的盛衰
——兼论陈寅恪“中原魏晋以降之
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 / 121

卷三 边塞环境与河陇历史宗教地理 / 143

第六章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
转移 / 145

第七章 五凉文化转移保存于东晋南朝说
——以河陇禅法的外播为中心 / 163

第八章 清代河陇民间信仰的地域格局与边塞特征 /195

卷四 边塞环境与河陇历史语言地理 /221

第九章 河陇上古汉语方言地理变迁 /223

第十章 唐代吐蕃内侵与河陇语言地理格局的演替 /236

第十一章 语言走廊——河陇近代语言地理 /251

卷五 边塞环境与河陇历史意象地理 /269

第十二章 他者的吟诵——唐代河陇边塞诗意象地理 /271

第十三章 自己的歌声——“花儿”流变的多元融会及其地域格局 /291

卷六 边塞环境与河陇历史民俗地理 /315

第十四章 农牧之别——社会经济环境与河陇庶民的时间生活 /317

第十五章 表里之异——清代民国河陇婚俗地理 /335

第十六章 边腹之分——清代民国河陇丧礼地理 /353

卷七 边塞环境与河陇历史文化地理 /369

第十七章 边塞环境与河陇历史文化地理格局 /371

参考文献 /408

后 记 /427

导 言

文化研究的地理视角与历史深度

一、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旧”之分

与其他内涵和外延周密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具有根深蒂固的模糊性。因此,威尔士文化分析家和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通过使用语境的辨析归纳,提出“文化”概念是在三种意义下被使用的。^①其一,文化是由“知识活动,尤其是艺术活动的作品与实践”组成的,是“有教养的”(Cultured)人们所从事的“优雅的”消遣。其二,“文化或文明,从其最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任何其他的技能和习惯”^②,即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个时期的生活方式。其三,文化是指对人的心智的培育过程,即“人文化成”。

正是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意义的多元化,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譬如,作为艺术或智力活动的文化,通常是文学者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考察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发展意义上的文化是运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方法的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文化地理学是文化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文化所标出的空间、充满意义的地点,以及文化所创造

^① Williams, R. (1983a) “Culture”, in D. McLellan (ed.) *Marx: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London: Fontana, pp. 15—55.

^② Tyler, E. (1871)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J. P. Putnam's Sons. 1.

的景观来孤立地理解文化,当文化被认为是多样的、碎化的和斗争的事物时,情况尤其如此”。^①因此,麦克·克朗(Mike Crang)称:“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②

特别是当人类学家面对当下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而惋惜时,借助于丰富的史料,研究人类历史文化的地域多样性的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利用文化景观遗迹和史料,探索地域文化景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也被美国地理学家惠特尔西(Derwent Stainthorpe Whittlesey, 1890—1956)称为“文化层”(sequent occupance)研究^③,即用一个地区在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特征来说明地区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关于文化、文化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之间的关系,正如周振鹤所言:“文化的发展既有时代的变迁,又有地域的差异。一般而言,研究文化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以及研究文化的传承与变异的原因和规律是文化史的范畴。而探索文化的分布与扩散的格局则是文化地理的任务。但是任何文化现象的历史演变总有地域上的表现相伴,而任何区域的文化面貌又总是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所以文化的全息图景必须由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坐标来表现。换句话说,研究文化地理离不开历史,研究文化史也不能忽视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地理已隐含着历史文化地理的内涵。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化地理就等同于历史文化地理,后者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比起前者来,难度是更大,范围是更宽,不但要求研究者有地理学的根底,更要求他们有历史的识见,从而也就成为一门引人入胜的学问。”^④

就文化地理学研究来看,20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是卡尔·索尔(Carl Ortwin Sauer, 1889—1975)的“文化生态学派”和后起的“新文化地理学”。

卡尔·索尔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学教授,他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被后人称为“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或“文化生态学派”,他们主张从长远历史的深层视角,研究文化区和文化景观的形式。索尔的研究方法深受人类学及美国新地理学野外调查传统的影响,他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等:《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3 页。

②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 页。

③ Whittlesey, D. S. *Sequent occupance*. Ann. Ass. Am. Geogr. Vol. 19, 1929, pp. 162—166.

④ 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本人也是一个田野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强调把民族志学的田野工作作为获得社会和文化新知识的最重要来源。索尔认为:

一定一直存在着一个基点,也就是一个观察者为了它的缘故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专家的地方。人文地理学者不应该只是这样的—个世界旅游者: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从一块土地到另一块土地,对于其中的任何一项,他都只了解一些偶然且似是而非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①

通过对农村聚落的长期观察,索尔提出了自己对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之间关系的理解(参见图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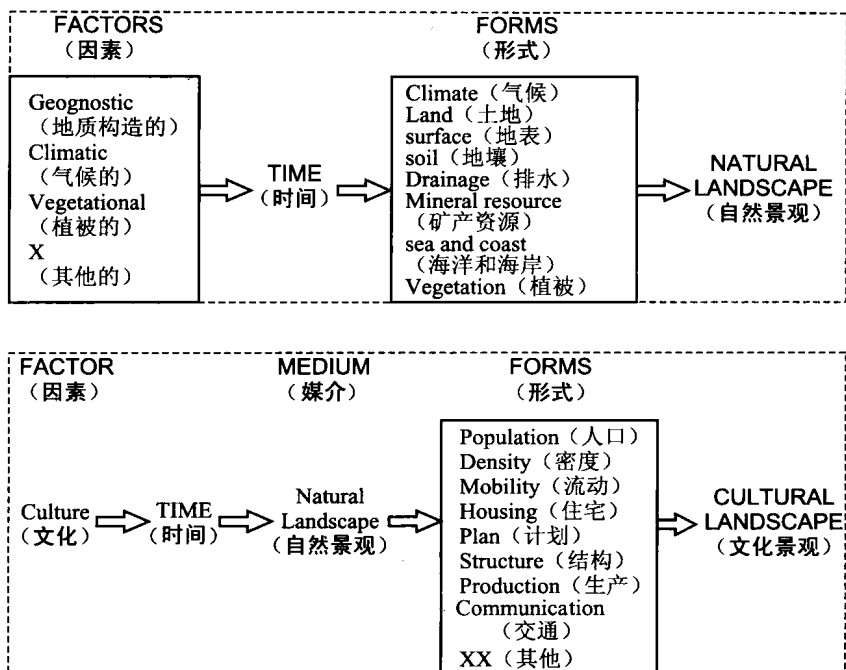


图 0-1 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Sauer, 1925)^②

^① Leighly, J.,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3, p.362.

^② Carl Ortwin Sauer,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Reprinted in Leighly, J., ed., 1974; *Land and lif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25, pp.315—350. 转引自[英]R.J. 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 柴彦威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第 133—134 页。

文化景观是某一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在某一特定文化的作用影响下,由于文化本身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文化景观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则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许最终将达到其发展循环的终点,但随着某种不同外来文化的介入,便开始某一文化景观的更新,或进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观残余之上的演化过程。

在索尔看来,文化地理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在自然身上所打的印迹”。解读这些不同“印迹”则需要通过确定文化区(指文化特征在均质程度上可以被识别的地理区域)的边界来完成。受文化生态学的影响,文化地理学形成了五大研究主题(见图 0-2),即①文化现象的空间表征——文化区(culture region);②文化的时间现象——文化扩散(cultural diffusion);③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④文化各特质之间的协调——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raction);⑤文化现象综合体——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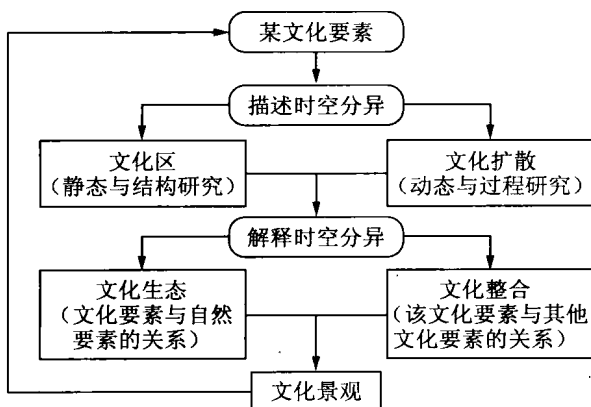


图 0-2 基于文化生态学的文化地理研究框架^②

后起的新文化地理学派,把研究的重点从文化景观转向了地理与权力、表征之间关系的探讨。他们认为,“通过文化地理学来理解文化,意味着

① Jordan T. G., Rowntree L., *The human mosaic*.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90.

② 李蕾蕾等:《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地理研究》,2004 年,第 1 期。

研究者有可能对差异和竞争作最好的理论阐释,而这些差异和竞争正是构成文化在地形、边界、流动、位置和定位的空间隐喻等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①。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的看法更为明确,他指出:“文化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意义不仅是被强加的,而且是被争夺的,这种斗争的程度丝毫不逊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在经济政治领域里,统治和被统治的社会关系不断地协商和抵抗。”^②也就是说,文化是“意义之图”(maps of meaning),社会集团试图用这种意义之图来定义自己、他人以及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这种定义过程所产生的身份认同与差异,会导致权力和对抗。在新文化地理学中,权力是一种到处扩散的、不确定位置的力量,它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并且在多重的、调节斡旋的网络中以间接的而且往往让人捉摸不定的方式被重新创造出来。这样,所有个体都处于既运用权力又受制于权力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集团是在同一场所产生意义,并且他们是通过权力和抵抗的关系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索尔所说的那样,各个集团和平地占有单独的文化区域。因此,“我们无论是调查真实还是想象的空间、地点和景观,都是为了通过他们寻找意义和权力在不同的情景下相联结的不同方式”。

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并不是如索尔认为的那样,是通过我们的眼睛传递给我们的,即我们通常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景象或一片土地,而是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因此,理解文化不只是简单地理解客观“现实”,一个可以在世界的“某处”被现成地发现的“现实”,而是存在着多重现实,每一个群体都有他们可以声称是“真实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只有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的形式才能得以利用。可以作为故事来讲述,可以作为油画来涂抹,可以作为电影来放映,也可以作为戏剧来表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得以表述的方式。^③所以说:“景观是一种文化图像,是一种描绘、组织或代表环境的图形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景观是非物质的,相反却更加说明景观可表现在许多不同物质和多种画面——画布上的作品、纸张上的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等:《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第185页。

② Jackson, P., *Maps of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 9.

③ Duncan, J. and Ley, D. (eds),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57—77.

文字以及地面上的土壤、岩石、水和植被。”^①对景观的解释涉及文化观念与文化过程,“解读某一地理景观并不是发现某个典型的‘文化区’,而是研究和发现为什么地理景观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意义,以及他们的意义是怎样改变的,又是如何被争论的”^②。也就是说,景观是意识形态的表现。

正是在这种理念下,新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阶级、性别、种族的权力关系等来研究现代与历史、空间与景观、城市与农村、支配与抵抗、表征与现实等之间的意义差异,并坚信文化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

二、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学术理路

20世纪80年代,在与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交流中,中国文化地理学才逐渐复兴。与之相较,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此时已步入学术正轨。^③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其一是1986年出版的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其二是卢云在1988年写就,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晋文化地理》。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语言和宗教是两个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但在中国,由于民众宗教观念淡漠,政治对宗教的强势控制,无论是佛教和还是道教的区域差异并不显著,故语言的研究就显得颇为重要。正如萨皮尔-沃尔夫假设(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所论,世界是通过由语言产生的概念网格而得到过滤的,而且对于特殊语言的惯常的、规则化的使用,产生了具有文化特定性的习惯化的思维模式。^④所以选择语言来研究中国文化地理,实际上是

① Daniels, S. and Cosgrove, D., *Iconography and landscape*. In Cosgrove, D. and Daniels, 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

② [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③ 关于此前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状况,正如谭其骧所云:“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文化发展的地域特征极为显著,历史文化资料之丰富,在各国中也是无与伦比的。照理,这门学科早就应该发展繁荣起来,但遗憾的是,他却长期处在极度薄弱的状态。在二三十年代,曾有丁文江等三几位学者粗略地摸过学术文化地理与人才分布,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建国后的很长时期里,这类研究竟无嗣响。”《汉晋文化地理·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④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等:《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第50页。

切中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命脉。因此《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无论是选题还是研究方法,都颇具创意。该书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二是方言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现象。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地理学问题,作者主要通过“移民与方言”、“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和“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三个专题来论证的。从方法上来看,最具创造性的是作者把移民史和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方言地理研究中,解决了许多重要语言地理问题,例如我国七大方言的渊源关系和地理格局,正是因为借助了移民史这一有力工具,才得以很好地解决。又如同言线的划分,单纯依靠语言学的方法,很难在语言过渡带内确定具体位置,而运用历史行政区划,就使问题的解决多了一个有力的工具。有鉴于此,郭在贻称他们二位所“揭橥之历史地理分析法,尤为具有独到性之伟大发现”^①。林涛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对二十世纪语言学进行总结时,称他们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开创并奠定了文化语言学关系论派的研究模式”^②。

如果说周、游二位是以单一要素——汉语方言为切入点,对历史文化地理进行贯通式研究的开创者,那么卢云的研究,则属于多要素断代研究的典范。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谭其骧认为:

历史文化地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认真予以研究。但是,该怎样把这门学科搞上去呢?我认为,首先,要注重基础性的工作,那就是:广泛占有资料,努力理清基本事实。……其次,文化地理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文化现象本身上,还必须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份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图,就无法确切地进行文化要素的区域统计,更无法制出文化分布图来。同样,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各类地理要素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此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成果与方法,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

① 《郭在贻致游汝杰函》,载《方言与中国文化·附录读者来信之一》(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② 林涛:《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